

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宁波

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宁波社会(之四)
——《上海年鉴》中的宁波(九)

田力

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,有关宁波地区社会情况的中文文献十分贫乏,在19世纪50年代,最重要的地方史料当属《镜湖自撰年谱》,该书的作者是安徽宿松人段光清(1798—1878,字明俊,号镜湖)。他于道光十五年(1835)中举人,二十四年(1844)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,发往浙江,历任建德、慈溪、海盐、江山等县知县。段光清为官亲民务实,善断疑案,以精明能干、政绩突出闻名于浙江官场。咸丰初年,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,浙江也在多事之秋,不少地方官民关系恶劣,势如水火,动辄聚众起事。咸丰二年(1852)春,宁波鄞县官府因打击私盐肩贩和催收钱粮激起民变(分别被称为“盐案”和“粮案”),乡民涌入宁波城,焚烧府县衙署,震惊全省。段光清被急调为鄞县知县,前往处置。他就任后,经过深入调查分析,果断采取平粮价、定盐界、安民心、分化瓦解等策略,不动一兵一卒就消弭了矛盾,避免官逼民反悲剧的再次发生,他也因此被宁波百姓赞誉为“青天”。此后数年间,段光清又历署宁波知府、宁波台道等职。在其暮年所著《镜湖自撰年谱》中,按照年月记载其个人生平事迹,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他所任职的宁波一地情况的记载尤为详尽。

作为宁波的“青天”大老爷,段光清在年谱中讲述自己处理一些地方事务时,总是将个人形象描绘得比较高大大正面,以至于当年年谱的整理者将其斥之为“替自己吹嘘”。而在笔者看来,段氏倒也不一定是有意吹嘘,但所谓“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”,如果有人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的活动进行记载,或许会更加公正客观。随着《上海年鉴》重现于世,我们惊讶地发现,居然真有这样的观察者,这个人就是玛高温医生。

在1852、1854和1856年的《上海年鉴》中刊登了多篇玛高温的笔记摘录,篇幅总长达数万字,主要讲述的是当时在宁波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。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前中期,段光清和玛高温都同时生活在宁波,两人的活动亦有交集,所以很多情况下,同一件事情,两人均有记述,一中一英,无论是互为补充,还是有抵牾之处,都非常具有史料价值,让读者对于这些历史事件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。比如,段光清上任鄞县知县不久,就有饥民聚众抢劫富户,趁乱闹事的人里竟然有浙江提督标下营兵,这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绿营的军务废弛和堕落败坏。段光清派人将营兵拿获,带回衙门审讯,没想到营兵自称是百总(清代绿营军中的低级军官——译者注),以为知县不敢治他,这愈发激怒了段光清,于是给营兵加了镣铐。之后,又有数百营兵来知县衙门哄闹大堂,直至宁波知府到来,才给段光清解了围。玛高温的笔记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:

没过多久,段大人就在人群里分辨出领头闹事的家伙,他那充满恶意的胡作非为和上蹿下跳的无耻行径,十分惹人注目。他是个百夫长(即百总——译者注),一位粗鲁的男性。当被传唤到知县的面前时,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戴着木质顶戴、有尊严的人,所以显得十分骄傲。由于在帝国的军队中管理上百号人,所以他被称为百夫长。

百夫长非常蔑视权威,拒绝承认法庭有审问他的权力。为了让他能够通情达理些,知县采取了与在管理良好的家庭中惩戒不守规矩



宁波妇人。约翰·汤姆逊(John Thomson)写的《中国与中国人影像》(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, 1873)一书中的插图。

的顽童一样的方式,命人将他翻倒在地,打了二十下。这是在衙门前一个敞开的庭院中实施的惩罚,聚集了大量的围观人,其中有不少还是绿营士兵。在被中国人称之为竹条的刑具抽打之后,他被带到知县面前,手和脚都被铐起来,就像个普通犯人一样。士兵们将这视为对于他们这类人的侮辱性行为,激动地冲向段知县坐着的地方,用暴力来威胁他。于是,后者摘下官帽,将其恭恭敬敬地放在案上。在场的民众发现,现在是时候进行干预了。因为段的这一别有意味的举动表明,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力。他们拦住了那些根本没有被知县的冷静决不惊吓到的士兵,于是又恢复了平静。面对一位要求只接受上级军官审判的军人,段知县的行为似乎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。但他深得人心,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,又是对于宁波不可或缺的人物,所以在第二天,全城所有文武官员和绝大多数的士绅名流联合起来,请求他不要计较之前的事情,继续留任,而段光清最终也答应了。

上述内容与段氏自己的回忆相差无几,足可以取信。但还有些事件,段光清年谱里记载不详,而玛高温的笔记里却信息丰富。比如,1853年年初,当时是冬天,根据段光清的说法,由于去年遭遇旱荒,“四乡贫民,向富室乞食,打门敲户,集众喧闹”,于是段光清与士绅富户商定,劝捐买米,赈济贫民,赈至麦熟停止。玛高温在1854年《上海年鉴》里对宁波的赈灾活动以及当中出现的乱象有详细介绍。他提到:

从富裕市民那里募集了超过七万银元的资金,用以购买粮食,分别在六座寺庙中无偿分发给穷人,由知县衙门里的一位下级官员负责相关事宜。除了真正需要的人,领赈的队伍中还混入了大批的无赖汉。他们并不需要救济,只是将此事当作是假日的消遣娱乐而已。开始介入到救济体系中的兴奋与骚乱,其令人讨厌的程度只不过略逊于暴乱而已。危险每日都在增长。

果不出玛高温所料,由于来领赈的人越来越多,而官府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,导致发生踩踏悲剧。段光清记载,事故发生时,他正在西门一带稽查,“人传北门一厂,因拥挤踏死多人,余亲往视,死者七人,皆带病及童子,发赈与领者皆散”,也就仅此一句而已。但玛

高温则是此事的目击者,他的场景描述极为具体:

在离我的住处几步之遥的道观,一大群老幼妇孺和残疾男子一直都吵着要进去,当道观的门被突然打开后,民众急不可耐地冲进庭院里,许多人被后面的人挤倒在地上,踩在脚下。这场混乱过后,死者和垂死者被安置在道观的各个地方。传信的人去向知县报告,而我也来到这悲惨的场景之中,看到有大约三十到四十位不同年纪的死伤者,从躺在死去母亲怀中的幼小婴儿到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。每个死者都被他(她)的一群亲友围着,这些人悲痛欲绝。我对那些尚有一口气在的人采用浓氨及其它药物进行治疗,很高兴地看到有十个甚至更多的人从窒息中苏醒过来。还有些人本来也是可以救活的,但是当前面两三个接受治疗的病人苏醒后,死者亲友相信冷水和神秘的兴奋剂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,没有什么话语能够平息这些人激动的情绪,他们强行将我拽往不同的方向,这也浪费了我不少治疗时间。有些人还将稀释了的酒喷向他们死去朋友的鼻孔和嘴唇之间。当段知县到来后,激动的人群痛骂知县的下属,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怒,他们将伤亡事故归咎于这些人的管理不善。段大人倒是躲开了这种抗议的叫喊声,他就像是拳击比赛里拳手的随伴人一样在我旁边,同时表现出想协助施用药物的愿望。让他感到惊愕的是,又有人过来报告说在西门郊区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灾难,段赶忙前往事发现场,我也紧随其后,到了之后才知道发生的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罢了。

看来正是由于玛高温医生的及时施救,才挽回了众多踩踏事故受伤者的性命。不过奇怪的是,在段大人的日记里完全看不到玛高温的身影。

段光清鉴于之前赈灾活动中采取当面给签的方法容易造成现场混乱,遂与富户商议,改成发票给米,但是需要三天准备,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发赈。段光清为此特意在城外设票,凡有来求赈济者,皆明告三日后备齐再赈。大多数人听了段大人的解释也自应允而退了,唯独最后来了几位“悍妇”,“恃众蛮横、出言无状”,段大人先是加以斥责,又作出担保“三日后定有赈”,但“悍妇数人,犹不肯散”,这让段大人很是恼火,乃至“自执藤鞭、责而逐之,始各退去”。

巧合的是,玛高温笔记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述,不过与段光清年谱中的相关细节有所出入,他写道:

数万人来到城里,他们都想着之前知县的承诺,给每个申请者一千元。为了将这些不速之客打发走,段大人在宁波城外的一处大型演武场与这些人开会协商,周围全是警察、扈从和士兵。他发表演讲来安慰失望的群众,劝他们先回去。但直到当场鞭打了胆大无礼的人(两男一女),人们才散去。需要顺便说一句,我们应当公正对待中国人,在这个国家,妇女受鞭打的频率要比在其他一些吹嘘拥有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低。这三个罪犯受到的鞭打没那么严重,以至于还能跟上知县的轿子直到他的衙门。在那里,他们依然喧嚷不已,最后迫使知县拿出了最具效力的“灵丹妙药”,一些银元立即就解决了这个麻烦。

在玛高温看来,以段光清为代表的宁波地方官员对于饥民的妥协行为,就是政府控制力下降的表现。他评论道:“由于官员们无法镇压民众的骚乱,其权威常常被蔑视;同时,他们和富人却被暴民所摆布,而且贫民和绝望者的数量又是如此庞大。因此,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以维护秩序。”

档案馆

责编 乐建中 美编 曹优静
2019年12月29日 星期日

投稿 E-mail: jiz@cnnb.com.cn



NINGBO ARCHIVES
宁波档案